

现实主义冲击波思潮研究*

- 以「分享艰难」, 「大厂」等作品分析为中心

曹惠英**

<目 次>

1. 引言
2. 本论
 - 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故事情节模式和人物安排结构
 - 2) 1990年代后期经济中心主义和“官”的处世
 - 3) 儒家性家长制的“官”和率先牺牲的“民”
3. 结语

1. 引言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文坛经历了两次比较显眼的现实主义大潮, 一个是在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写实主义, 另一个就是出现在90年代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写实主义是一个中国文坛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寻根、现代派、先锋小说等创意性实验, 相对偏重于现代主义文艺技法以后, 重新回归于现实主义的文艺现象。因为新写实主义在写作方面很写实却在艺术思想方面受到存在主义洗礼, 能够给中国大众一个很自然地接触现代主义思想的机会, 文学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并且新写实提倡了新的写实技法, 全面遮断作家情感介入的零度写作, 再现对象的时候彻底排斥价值判断的原形态复原等, 都是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文艺果实。

* 이 연구는 인천대학교 2014년도 자체연구비 지원에 의하여 연구되었음.

** 인천대학교 중어중국학과 부교수

那么现实主义冲击波思潮应该被解释为在什么样的文坛脉络当中出现的，并且文学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直受到“个人化写作”时代的评价。首先，新历史小说在写实的基本叙述态度以及尽可能回避直接表露作家所追求的价值趋向，继承了新写实的艺术特点，但正用非常个人化的眼光来重新构造边缘的、从没被提起的人物和故事，由此表示对于以前历史叙述的颠覆时，虽然在创作分量上看，涉及到一百多年历史的长篇力作出现得不少，但文学所涉及的内容本身好像离时代共同话题远下去。90年代急变的时代情况下，文学又围困在个人的、新历史的、女性的、新状态的写作之中，对此也有认为中国文学终于达到了真正地开辟作家固有的精神家园的时期了。

就这样，中国文学好像不再谈论作家的时代介入、干预生活话题的时候，直到90年代中后期直言说当下社会重大时事问题的小说竟然登场。它们拒绝了新写实的零度叙述，却在作品中注入了作家强烈的感情和露骨的价值趋向。1996年前后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为代表，何申「年前年后」、「穷县」，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谈歌的「大厂续篇」等一系列中篇小说，先后出现了。其后李佩甫的「学习微笑」、徐坤的「狗日的足球」、阙迪伟的「村长出事」等作品相继出现。还有何申、关仁山、谈歌这三位作家，都是河北出身的，被评论界称为河北三驾马车的青年作家。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描述国营企业和农村乡镇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艰难；工人的下岗、国营公司的倒闭、农村的资金紧张、农民的负担等，这些社会重大话题成为其小说的主要内容。

面对这些表现国有企业和农村的基层干部及人们生存状态的小说，刚开始评论界和媒体都表现出积极的反映，正如雷达所言，“它们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毫不掩饰地、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并力图写出艰难竭蹶中的突围。它们或写国营大中型企业，或写一角乡镇，全部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其时代感之强烈，题材之重要，以及给人的冲击力之大，都为近年来所少见。它们出现的时间都很相近，揭示的矛盾和问题也一样的相似，就形成了一种阵势，称它们是一股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也许是恰当的。”¹⁾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称呼可见由此而

流行。接着1997年『文艺报』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大讨论,²⁾评论家对他们的创作或褒扬或贬低,三驾马车成了文坛的热点。围绕该思潮的评论和媒体活动很活跃,从90年代后期到今世纪以来,有关该思潮的评论文章还继续出现。

不过这些评论呈现出赞美和批判的明显对立。表现赞同立场的评论首先关注了该思潮所涉及的题材上的贡献;如它们把目光直接切进了当前改革中的大中型企业和基层农村中去,这本身具有填补空白或断层的意义。³⁾还提到有些作品如「大雪无乡」⁴⁾等,看中了这部作品跟踪一家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全过程之后创作的,就认为这是作家们直面现实的、将当今现实中的矛盾不加粉饰地记录下来的勇气。⁵⁾第二,这些评论认为该思潮描述了社会底层人们艰苦的生活,作品中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社会关怀精神和公众意识。⁶⁾他们认为该思潮重新使文学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⁷⁾并且通过描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并未获得应得利益反而受到伤害的人们,向他们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写出了困境中人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患难中的真情与价值的重建。⁸⁾

然而,坚持批判立场的评论,首先严厉地表示怀疑该思潮的现实主义之是否;这些评论认为所谓现实主义应该继承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此

-
- 1) 雷达,「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文学报』,1996年,6月,27日。转引自时空,「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讨论」(『飞天』,1997年,12月,103页)。
 - 2) 有关的评论现况如下:雷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对他们的创作表示积极的反应。1996年『作品与争鸣』的第1、8、11、12期,分别刊登了“三驾马车”的作品和评论文章。『文艺报』组织的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中,陆贵山的「铁肩担正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童庆炳的「历史——人文之间的张力」,刘润为的「历史与人文之辨」,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论争。1997年『钟山』,第1期,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中,陆建华、王彬彬、朱昌盛、丁帆、邵建等评论家对“现实主义冲击波”进行了讨论。1998年『文学评论』,第4期,又刊登了童庆炳、陶东风的「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认为他们的作品既没有人文关怀也没有历史理性。
 - 3) 肖复兴、朱向前,「96收获与97展望」,『文艺报』,1997年,3月,4日。转引自时空,「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讨论」(『飞天』,1997年,12月,104页)。
 - 4) 关仁山,「大雪无乡」,『作家报』,1996年,7月。
 - 5) 陆建华,「关注现实,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钟山』,1997年,5期。转引自方守金、李扬,「现实主义冲击波与新时期文学探索的终结」(『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3月,136页)。
 - 6) 郑建明,「依托与超越」,『文艺评论』,1999年,4月,43页。
 - 7) 杨显倾,「“三驾马车”的创作及其新变」,『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3月,59页。
 - 8) 杨立元,「现实主义冲击波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月,64页。

同时，要具备描写一切人类灵魂底蕴的艺术深度。但该思潮的作品“不仅没有批判权力和金钱，而且还制造了人治和金钱不可战胜的神话，作家们对厂长乡镇长为发展经济为赚钱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给予深情的理解和赞扬。⁹⁾就这样该思潮“离弃了现实主义的批判使命，转而代之以一种赞美理论。¹⁰⁾并且该思潮作品的中心人物都淹没在缺钱、到处找钱、出问题、堵住漏洞的各种事件之中，至于人们心灵的冲突，灵魂的痛楚，几乎没有触及到。¹¹⁾现实主义不可能与通俗易懂、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划等号。¹²⁾该思潮的“一种肤浅的历史进步论在销蚀着作家的道德情怀”，¹³⁾这些小说的中心人物“对现实中负面的一味妥协，对转型期的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的态度”，这就是该思潮缺少人文关怀的确证。¹⁴⁾再说，该思潮被认为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群众、为他们代言，¹⁵⁾但是实际上却强迫要求他们默默地牺牲而已。甚至认为该思潮倒标志着“一直虚弱不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又一次彻底的堕落和破产。¹⁶⁾

当然，如上平面的简要是现实主义冲击波思潮根本没被介绍的国内研究情况下，很容易引起不应该的误解。首先必须得指出赞美该思潮的评论主要根据于题材方面的贡献而展开的单调性。此外还得提到它们登载的大部分期刊只不过是些大学学报，甚至以河北地区为中心的水平，与此相反，批判该思潮的文章主要登载在核心期刊上了。并且不得不提及该思潮的作品在审美角度上看，其完成度很低，作品之间的相互复制性也很高。这样说来好像没什么意义去研究现实主义冲击波似的，可是它作为轰动一时的文学现象的确出现，甚至要解读90年代这个时代文本时，会发现不能不谈的、富有启示性的思潮。当考虑中国现实主义因素具体的进展时更为如此。

9) 萧夏林，「泡沫的现实和文学」，《北京文学》，1997年，6期，60页。

10) 同上。

11) 王彬彬，「当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文艺争鸣》，1996年，11月，15日，80页。

12) 同上。

13) 王彬彬，「肤浅的现实主义」，《钟山》，1997年，5期。转引自沐金华，「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题材得失谈」，《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2月，12页。

14) 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46页。

15) 郝雨，「在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契合点上——论“三驾马车”与“现实主义冲击波”」，《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7月，67页。

16) 萧夏林，「泡沫的现实和文学」，《北京文学》，1997年，6期，59页。

因此本论文为了讲明现实主义冲击波在90年代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中具有什么样现实主义的脉络、什么样的意义，试图要与改革开放之前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互比较分析，这是一个没有先行研究而头一次进行的。「分享艰难」、「大厂」等作品是些被大部分评论认为该思潮之代表作，前者是涉及农村政府的财政困难问题的，后者是涉及国营企业财政困难问题的。本论文将分析这两部代表作品时，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达到顶峰的文革时期一些作品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出其结构上的相同点。此外，按照论述的必要还会提及「年前年后」，「九月还乡」等该思潮的其他代表作。本论的第一，介绍作品的大体情节之后，就进入上述的两者之间的比较分析。本论的第二，第三，着眼于两者之间的不同点，细论人物形象化问题，由此试图要讲明该思潮对于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核心词所做出的反应方式。

2. 本论

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故事情节模式和人物安排结构

「分享艰难」¹⁷⁾的主要内容是因为西河镇的财政困难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和问题。作品以主人公西河镇书记孔太平为中心，叙述了解决这种财政困难问题的过程。在每个事件和问题都提供了人物的登场，这些人物之间利害关系的冲突构建了故事的主架。「分享艰难」描写的主要事件大体如下：因为镇上的财政困难，教师和干部职工的工资陷入了反复拖欠的状态中；洪水和泥石流引发了财政困难区域的难民救护问题；西河镇财政的绝大部分财源出自王八养殖场，那里的农产品企业家洪塔山的恶行和无赖行为；将一把手孔书记看为自己竞争对手的西河镇二把手赵卫东镇长的阴谋和伎俩；平生以种植棉花为生的田细伯和与他的农田相隔一堵墙的养殖场经营者洪塔山之间的矛盾等。

17) 刘醒龙，「分享艰难」，《上海文学》，1996年，第1期。

小说是从孔书记为解决西河镇教师们拖欠工资的问题，通过对镇上个体户的违法赌博进行突查获得罚金的故事开始的。孔书记的做法侵犯了派出所黄所长的利益，所以与其在赌博罚款的处理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孔书记立即请来新闻媒体的记者和各学校的校长，使不知道来龙去脉的黄所长出席那个场合，诱导其将罚款用作教育基金。被抢走赌博罚款的黄所长将洪塔山养殖场的大客户，以性交易现行犯为名进行了逮捕。这时，出现了许多因泥石流灾害而遇难的灾民。孔书记于是安排养殖场的大客户前往灾难现场进行慰问。在难民们的泪水中，大客户们进行了捐款。派出所的黄所长被他们捐款的行为感动，将扣押的身份证还给了他们。

孔书记在政治方面的竞争对手赵镇长认为，如果王八养殖场发生问题的话，孔书记在政治方面的业绩将受到巨大的打击，于是他对洪塔山进行了秘密调查。他收集了全部公款嫖妓的形态和可以证明公款嫖妓的、印有同意报销字的发票复印件，并将其暗地里送到县公安局。孔书记利用刚成为干部不多久的孙萍和她大学同学小马的关系，向本事件的负责人小马送了1000元的礼，成功地销毁了与洪塔山相关的资料。赵镇长又鼓动洪塔山收购田细伯的棉花地，田细伯的女儿毛毛拿到土地合同的时候，不巧被爸爸发现。一辈子以农耕为生的田细伯本来就对王八养殖场的堕落深恶痛绝，再加上发生了这种事，于是十分气愤与洪塔山厮打在一起。结果发生了洪塔山的大狼狗咬伤田细伯小臂的事故。洪塔山被关进了公安局，孔书记去探望舅舅田细伯时挨了一顿臭骂。孔书记为了养殖场的事业将被拘留的洪塔山放了出来。没过多久就掀起了反腐败的浪潮，食用王八的销售大大下滑，洪塔山与跟父亲一刀两断的养殖场销售主任田毛毛一起，为宣传和销售食用王八前往外地出差。一个月后回来的毛毛接受了宫外孕手术。对毁了自己表妹的洪塔山，强忍着愤怒的孔书记再次让洪塔山恢复了职位。孔书记得知，把外貌出众的毛毛安排在洪塔山身边的正是赵镇长，他打起精神不让自己陷入赵镇长的阴谋中。前往医院探望毛毛的孔书记没有离开医院。很多人来找他们，说为了解决教师和干部的工资问题，不能停止养殖场的运营。舅舅和舅妈与孔书记都在现场。最终田伯告诉孔书记为了让西海镇的百姓过年能够吃上一点肉，决定不告发

姓洪的。孔书记跪在舅舅面前放声大哭，并表示十分感谢。重新回归的洪塔山将自己的个人车辆桑塔纳卖了，将卖车的钱交给了镇政府。西海镇的教师、干部职工的工资问题终于在过年前得到了解决。

作品情节的大体介绍如上为止，开始进如与文革时期作品之间的，即将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模式推向顶峰时期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分析。文革时期的小说中人物的安排，基本上是引领革命事业的英雄人物，与英雄人物同在的正面人物，为英雄人物带来鼓励和教训的贫下中农人物，有过错误但具有改善余地的落后人物，以及在阶级上与英雄人物走在反对路线的反面人物来组成的人物配置模式。¹⁸⁾ 这样的人物安排尤其在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知青题材小说中体现得无比完整。因此从文革时期的作品提供的人物配置模式来看，「分享艰难」的人物有英雄人物孔太平书记，正面人物黄所长、孙萍和妇女主任等。贫下中农有田细伯，落后人物有田毛毛。反面人物有赵镇长和洪塔山。也就是说「分享艰难」中的人物，具有非常明显的文革时期的记号性功能，他们在定好的框架中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第二，文革时期小说的整体情节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整理。例如有需要完成的任务，在完成的过程中，展开了人物的二元对立的构图。以反面人物为中心的妨碍工作和因自然灾害等造成的艰难的局面最终被克服，以英雄为中心的革命大业终于完成，以大团圆为结局，并暗示着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文革时期作品故事情节模式。与此同样，「分享艰难」也是在克服财政困难这样的大前提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展开了人物间的二元对立。战胜了自然灾害或反面人物的伎俩、阴谋和妨碍工作，最终通过分享和整合的各种过程，解决全部问题，展现出了乐观的未来，并以此为结局完成了故事的基本情节。

第三，在这样的故事情节模式中，二元对立模式始终唤起道德伦理上的善、

18) 本论文所提及的文革时期小说主要以当时公开出版过的知青题材小说，如「边疆晓歌」（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军队的女儿」（邓普，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征途」（郭先红，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青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分界线」（张抗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等。如此选择的主要根据来自于主人公英雄知青人物的成长过程和完成革命事业的过程，很符合于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中的主人公基层干部的成功历程。

恶价值的判断。对代表恶的势力，具有感情上的憎恶，对代表善的势力具有人格上的认同和亲密感。此外，在完成任务或课题的整个过程，具有非常强烈的目的论指向。还有大团圆的结局、对光明未来的信念等都表示了进步论式的乐观。这些因素也可说与文革时期的作品十分相似。这种与文革时期的作品类似的人物安排、故事情节模式、二元对立的善恶结构、道德追求、审美趋向等，在「分享艰难」的作家刘醒龙的其他作品中，例如被选定为'98中國年度最佳中篇小说的小说「大树还小」等，也有同样的体现。可看为这种与文革时期的作品相连接的思维模式、审美取向等，已经给作家身上进行了内在化。更有趣的是，在现实主义冲击波思潮的其他作家作品中，如上的情况同样出现。

让我们分析一下谈歌的「大厂」。¹⁹⁾「大厂」描述了因前任许厂长的贪污腐败而濒临破产的工厂，拥有巨大的负债，并处于经营困难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现任厂长吕建国为中心，故事得以展开。故事情节的主线围绕因工厂财政困难所引发的诸多事件和解决财政问题的过程而进行。「大厂」的主要内容有如下：故事是从工厂的厂办公室主任老郭在为河南大客户郑主任提供的性招待现场被公安发现后，与公安发生暴力争执，做为嫖娼现行犯和暴行犯被逮捕的事件而开始。随后，厂里唯一的高级轿车被偷。年初，一大帮要账的工厂债权人住在厂接待所里不走，他们要求厂里还钱并引发了骚乱。厂里技术骨干袁家杰被乡镇企业高薪挖走，递交了辞职书。厂里的收款不顺利，回款的事情很不如意。特别是赵明没有支付厂门口盖饭馆的10万元承包费，还有四海商行的赵志高也不还欠厂里的六十多万元。此时工厂职工中出现了病号。厂里的老劳模章龙师傅得病没钱治，只能在家中疗养，受了很多苦。生产骨干小魏的女儿得了白血病，做手术需要好几万块钱。此外，没能够当成厂长而受气的纪委书记齐志远或赵副厂长等，消极地处理着吕厂长交代的任务，领导层很难团结一心。

在解决工厂总体难关的过程中，集中进行描写的人物是吕建国厂长。将吕厂长放在中心，其他人物的安排也自然有了条理。也就是说吕建国作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为积极帮助他的贺玉梅书记、方大众等，很自私常犯错但最终回头的落

19) 谈歌，「大厂」，《小说月报》，1996年，第3期。

后人物为纪委齐书记和袁家杰等。作为阶级敌人的反面人物是赵明，对英雄人物进行鼓励和支持的贫下中农角色为章龙师傅。从这样的角度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大厂」的人物安排与「分享艰难」一样，反复地展现出文革时期作品的面貌。在叙事模式方面也与「分享艰难」一样，几个事件同时发生并展开，通过矛盾的高潮、极端的调解和大团圆结局，表现出乐观的未来。在解决财政问题的过程中，也同样体现着善恶间的二元对立构造，强烈的目的论指向和对进步论的信念等。

2) 1990年代后期经济中心主义和“官”的处世

下面将通过更为具体的分析人物形象化问题，试图讲明现实主义冲击小说不同于文革时期作品的面面，并靠此揭示该思潮对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主要问题的反应方式。首先，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最为突出的还是孔太平书记、吕建国厂长等基层干部人物，他们是作家叙事的焦点。此外，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问题。因此，作为英雄人物的基层干部人物和作为反面人物的经济能人人物之间只能出现一种复杂奥妙的互补关系。假如是在文革时期的作品里，英雄人物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来自阶级敌人反面人物的任何经济惠利。当然，文革时期作品中那些知青英雄人物所要完成的主要革命任务往往也是与增加产量有关的经济活动。只不过文革时期作品过度地责难反面人物的代表特征；图谋经济私利的面貌，却导致了追求经济利益本身在道德方面的质疑，这样看来，现实主义冲击波将洪塔山、赵明等经济能人人物，一概地描写成在道德方面深有缺陷的反面人物，并且他们能够致富的市场运作仍然被描述为非正常态的、肮脏的机制。可知文革时期已有的针对经济活动的一种思路，仍在9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得以复现。

这样一来，围绕经济话题要讲明两者之间真正的不同之处，还是得察看英雄人物即基层干部人物怎么对待反面人物即经济能人人物的。孔太平书记和吕建国厂长等，与高、大、全的文革时期英雄人物不同，具有妥协、折中、利用手段、进行协调，也就是说具有很擅长协商的面貌。甚至他们的妥协是为了解决财政困

难的问题，似乎可以漠视全部原则、标准、规定和法律似的，似乎认为一切都成为妥协的对象似的。比如，孙萍通过自己的关系处理事件之后，向孔书记要求以入党为其代价时，孔书记却没有任何在意，便同意将入党成为交易手段的这一买卖。还有毫不犹豫地拿出一干部和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恶人们都很会使用的，万人通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在「大厂」中欠工厂食堂承包费的赵明，因为其姐夫是市委常委所以惹不起。就算起诉欠工厂60多万的四海商行的赵志高，因为他表姐夫就是法院院长，没办法只能放弃起诉。这些都是反面人物利用关系的例子。但是为了使小魏的女儿住进医院，就是为解决厂里病号的问题，一位职工甚至去找到在医院当副院长的小姨子的婆婆。吕厂长在见公安局的陈局长时，仍然利用了他与纪委书记齐志远是个党校同学的这一关系。为了寻找工厂被盗的车辆，没有办法克服谭乡长的横行霸道和门县长的拒绝时，利用三车间的岳秀秀是门县长的亲外甥女这层关系，立即获得了门县长的积极协助，并立即找到了丢失的车辆。这些正是正面人物利用关系的例子。

那么，莫非作家们是为对9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和基层干部的这种形态进行暴露和讽刺，而对这些场面进行描写的吗？正如拥护现实主义冲击波思潮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是从社会底层人的立场出发，对腐败生活的现场进行的批判性描写吗？我再次地回答吧，绝不是这样的。这还不如说，具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指向性、其过程中绚烂的（或者与正义无关的）手腕和类似于本能那样敏锐的分寸感，对于这样的孔书记和吕厂长们，作家自己的彻底认同，就没有通过任何批判性思考的过滤，而直接暴露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何解释将他们设置成为英雄人物，并为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安排的叙事模式的高度集中，以及煽情的感动模式的使用呢？

此外，每当描写基层干部人物处理经济能人人物与财政相关的细节时，将他放在精明能干的，严格的管理者位置。就如使一点防备也没有的黄所长将赌博的罚款用于教育基金后，又向教育机关的何站长单独施加压力，迫使其将一部分教育基金的捐款再返还给镇党委的孔太平书记的面貌。在与违法赌博的罚款相关的细节中，孔书记对因与家人打麻将被罚后表示冤枉的村里老人进行了恫吓，这时

孔书记的斥责十分值得反思。

“不是共产党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们这些私营业主先富起来，你们能有今天这么大的铺子？……莫以为自己逃税的手脚做得干净，让你逃才逃得了。孔明知道关羽会放曹操才让他去守华容道。不让你逃时，你就是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得了共产党的恩惠却想着王八的好处，这叫什么，这叫混帐王八蛋！”²⁰⁾

这就等于明确地宣布，对经济能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许可或禁止的一切权利是属于共产党的，也就是说管理者的，“官”具有与诸葛孔明或如来佛一般的全能，并处在管理一切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代表“官（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人物为解决经济问题，不仅向现实中的恶进行妥协，并处在对恶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位置上。

因此，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提供的基层干部人物的形象，告诉我们该思潮不可能是为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和立场进行辩护的，还有这些基层干部人物的面貌跟文革时期的英雄人物形象互相比较时，他们在道德方面的缺陷浮出得太显眼了。也有可能为了消解这种差距，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基层干部们要克服财政困难的最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这一情结。包括孔太平书记和吕建国厂长，以及「年前年后」²¹⁾的七家乡乡长李德林等，这些基层干部人物都被描写成一个拥有为人民的，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忘记群众的崇高品质的人物。那么这些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3) 儒家性家长制的“官”和率先牺牲的“民”

为了掩盖基层干部人物在道德方面的缺陷，现实主义冲击波另外又强调了所谓紧急状态的时代背景。当解读90年代后期的时候，强调处于剧烈变化的过渡期

20) 刘醒龙, 「分享艰难」, 360doc个人图书馆, 第3页。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412/10/276501_202961402.shtml

21) 何申, 「年前年后」, 『小说月报』, 1996年, 第3期。

中的，未定时期的危机意识，由此对基层干部人物的非正常行为试图进行无罪化处理。不过，在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为了使基层干部人物的“克服财政困难”，成为更加切实、崇高的目标，所采用的对策就是将人民、群众推了出来。因为三个月没发工资而营养失调入院是学校教师，身为劳动模范，不为自己花一分住院费的章龙师傅，工厂技工患白血病的女儿，这些善良的人民病号的出现就成为了必需的条件。

那么孔书记和吕厂长等所谓的“官”和农民/工人/人民群众等“民”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在作品中怎样体现的呢？为了对此的具体考察，我们需要对孔书记管理西河镇的面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在作品中，除了解决财政困难的，或与财源相关的问题之外，孔书记等干部人物大部分被描写成为相当具有人性魅力和吸引力的。比如，坐着破破烂烂的吉普车执行公务的孔书记不叫苦不叫累，反而对司机小许关怀有加，晚上回来洗着澡停水了，就向楼下喊着别用热水行不？洗完澡后光着上身听听报告。听说镇学校的老师住院的消息，他半夜敢去医院慰问。洪塔山的大狼狗咬伤田细伯，田细伯住院时，展现出了一个孝子的面貌。这样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中的干部形象就体现出了儒家家长制的价值。²²⁾

这些基层干部人物，具有与人民无隔阂，慈爱的保护者般的父兄官，父母官形象的同时，他们又是对与人民群众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统治和管理的信息管理者。西河镇的所有人们，从因工资问题等大事儿找来的杨校长，到因日常小事前来伸冤告状的张三李四，都会去找西河镇的一把手孔太平。这样一来，全家人喝一碗杂骨汤而过端午节的是胡老师家；昏暗的夜里对着墙解手而说孔书记的是杨校长和徐书记；他们的秘言窃语就这样，都被躲在角落里看着他们的孔太平书记听到了。不管在哪里都躲避不了孔书记收集信息的监视网。包括那些十分隐私的内容，都会传入孔太平的耳朵里。

也就是说，孔书记和西河镇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公务员与人民之间的公务处理关系。代表“官”的孔书记参与到人民的一切喜怒哀乐，甚至对人民私生活的秘密都进行干涉，并通过这种方式保护、指挥、统治“民”。他们为了确保

22) 舒也，「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作家的价值观剖析」，《文艺研究》，2003年，3期，39页。

自己对“民”的这种权威和领导力，始终保持富有真诚的形象。而且“官”的这种真诚就靠他们流泪的场面最能得着确认。在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基层干部的眼泪具有强力的整合效果。具有代表性的是贫下中农田细伯站在孔书记的立场上想，然后做出让步的场面。前来探望毛毛的孔书记，在病房里处理公务，田细伯于是一直听到了不能像这样扔下养殖场不管的报告。最终，田细伯说“不告姓洪的了！”时，孔书记跪在地上，流下了江水般的眼泪。

正象用眼泪获得江山的刘备一样，他们通过数不清的眼泪来分享艰难，解决矛盾，对社会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大团圆的结局。在「大厂」中登场的吕建国厂长更是如此。在作家谈歌的笔下，吕厂长解决问题时使用的最频繁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眼泪。几乎大部分矛盾的最高潮，或问题被解决的那一瞬间，吕厂长的眼泪不无例外地出现。例如面对前来厂里要钱的债务者时，吕厂长作揖，揖着揖着就泪流满面了：为了拜托公安局的陈局长释放被关起来的手里拿着一千多元合同的郑主任时，泪就淌下来，吕建国抬手去擦，可流得更猛了：劝章师傅用市工会特别划拨的款项入院治疗，而章师傅却坚持要用那笔钱为厂里卫生所进药，并鼓励工厂的领导者不要绝望，在艰难的时候更是要坚持下去。当章师傅提及毛主席时，吕建国的泪唰唰地流下来：小魏女儿毛毛动手术的那天，小魏和他爱人扑通跪下并对吕厂长说，不能因为女儿的住院费就花掉工厂里的钱，吕厂长说着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无能，说着说着就流下泪来。

如上所见，他们的泪水将消解一切纠葛和矛盾，实现一家人真诚的合一，奇迹般地解决一切问题，并成为导出结局的神秘的妙药。因此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这种大团圆结局，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充满想象的解决，从而追求整合的评价，²³⁾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当准确的分析。在何申的「年前年后」中有乡长李德林，在过年时突然到访村中的一户居民家，就像这家人中的一份子似的，与他们一起坐在矮矮的凳子上，一起喝饺子汤的描写。那天还正好被前来拍摄农村过年景象的电视台记者团拍摄了下来，在电视媒体上被当成模范干部进行了宣传。

23) 姚新勇，「现实主义还是意识形态的弥合剂—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59~60页。

也就说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刻画出的煽情的感动结构，是为传播如同父兄一般慈爱，如孝顺的儿子一般，如同充满儒教思想的家长“官”和，受到其保护和指导、乐于牺牲的“民”一起创造的幸福模式。

问题是在这种“官”与“民”的理想模式中存在的，对“民”一方的榨取和暴力，并对此的默认。因为在这种理想模式下，“民”只能处在永远被动的结构中。“民”总是在“官”主动分配的艰难中，被动地接受着自己得承受的分量。在关仁山的「九月还乡」²⁴⁾中，九月作为农民工前往都市之后，成为了三陪小姐，沦为了嫖妓。她作为嫖妓的经历（信息）被故乡的兆田村长得知（收集），她回到故乡，为了不让故乡的人们知道她在都市中的所作所为，被村长威胁，最后为村里乡镇企业的大客户冯经理提供了一晚的性服务。就算是这样，结论仍旧是因为财政困难，无可奈何地做出卑鄙行径，并为此悲痛不已的村长，和在都市中靠肉体赚钱时，感到十分羞耻，但那一晚不知为何却感受到了崇高的牺牲精神，并为此感到自豪，感到堂堂正正的九月。最终导出了大团圆的结局。

在这种“官”与“民”的理想模式中，“民”作为主人的民主得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李贯通的作品「天缺一角」²⁵⁾中，刻画了原本国家文物法规定对元代以前的石刻只许翻刻副版传拓，但当港商唐先生以3万买一张汉画像石的拓片时，高部长为克服财政困难甚至将其卖掉的故事。这时，高部长为防止自己的行为因违法而被引出麻烦，将村里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召开了民主大会。人们听完领导的详细说明后，一致表示与遗产相比，当然要选择金钱。在何申的作品「乡镇干部」²⁶⁾中也描写了在选拔镇领导的过程中，民主主义变得毫无意义的场面。根据村民的选举结果，当然是得票数最多的杜满仓担任镇党委书记，但最终连担任镇长资格都没有的支秀杰成为了镇党委书记，杜满仓被安排为连实权都没有的镇人大主任。这一切都是县委姜书记搞的鬼。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自己在提供着民主主义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方式——投票和选举，被“官”在人治中恶用的确证。

24) 关仁山，「九月还乡」，『十月』，1996年，第3期。

25) 李贯通，「天缺一角」，『大家』，1996年，第1期。

26) 何申，「乡镇干部」，『年前年后』，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

3. 结语

如上所看, 90年代后期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 在故事情节方面, 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克服一切灾难以及妨碍势力, 完成(革命)事业的模式化处理, 在人物安排方面, 英雄人物、正面人物、贫下中农人物、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等, 布置得结构化处理, 在叙述展开方面, 显明的二元对立为主线, 最终达到大团圆的结局, 由此揭示乐观的未来和进步的信念。作品的这些特点正好与文革时期一些小说的特点, 完全相符。在审美趣向、价值追求、善恶的条件等方面, 如此与文革时期作品相似的文学思潮, 重新出现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中。就当想起80年代后期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而出现的新写实时, 不能否认现实主义冲击波与新写实主义, 虽然在表面上一样地继承着现实主义的写作姿态, 但是将这两者定位在文学史上的话, 相距太远, 形成鲜明的对立。而这本身告诉我们盛行于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 针对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主流话语进行解构式叙述时, 文学好像否定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时期的价值之后, 还没有坚定地树立起新的追求方向之前, 太早地参与掉解体工作, 从而导致原鬼复辟的难看。

除此之外, 文章还重点分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提供的作为英雄人物的基层干部形象。这些书记、厂长、乡长们,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引起的各种问题, 针对经济能人或拥有财源的人物, 采取不择手段的妥协、协商、请求的态度。不过与此同时, 代表着“官”的这些基层干部人物, 明确地宣布自己才是管理经济财富的权威者, 得不到管理者的许可, 就没法累积财源的道理。第二, 这些基层干部人物对待一般人民群众的时候, 不同于处理财政时的那样严格、精明、手腕多变的面貌, 却展现出朴素、谦虚、体贴, 善于跟农民、工人混在一起的, 正如儒家家长制的父母官、父兄官的面貌。还有为了维持“官”对于“民”的, 靠着掌握有关“民”的所有信息, 包括私人领域的在内, 以此为前提条件的介入、干预、管理, 能够得以实现, 基层干部人物始终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真诚。而这种真诚主要通过基层干部人物的眼泪得以表露。

“官”的流泪正像魔术一样, 整合出所有矛盾、纠葛, 弥补一切间隔、差距,

使得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一家人的妙药。不过，像“父母官”的基层干部真诚的眼泪和乐意接受其保护、管理的“民”所组成的幸福模式，总是要求“民”一方的吃亏及牺牲。小说中的田细伯、章龙师傅、九月、田毛毛等，都是这种乐意牺牲的代表。因为父兄般的“官”掌握着有关“民”的一切信息，靠此来分配怎么分享艰难时，“民”只能处在永远被动的、被管理的状态。并且在这种单方面的管和被管的幸福模式下，“民”成为主动角色的、成为自己主人的民主主义的确是难以实现的。

通过如此虚假的“官”与“民”之理想关系模式，要实现社会大整合的意图，不得不承认是在替90年代后期官方意识形态的梦想而代言的。既然如此，赞美现实主义冲击波评论依然出现，甚至一些该思潮的作品被评为秀作而得奖。并该思潮的作家靠着仍不变的创作热，最近还出版了系列的长篇力作。²⁷⁾ 不仅如此，该思潮所提供的基层干部人物形象，通过更为立体化的再复制过程，活跃在各种影像作品之中。²⁸⁾ 这些影像作品几乎都表示在艰难处境下为人民而奋斗的基层干部人物对他们慷慨的认同。再说，被塑造成时代的英雄及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基层干部人物的形象，在构成90年代后期中国文化史方面，已经成为了不可否认的主要因素。当然，不少赞美该思潮的评论所重视的所谓题材方面的贡献，确实不可否认的，并且该思潮的作品本身有时候可看为，具有暴露时代情况具体面面的文本性特点的。不过，从这种角度样来判决该思潮作品的使用方式，当考虑这些作家的创作意图时，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反讽。

27) 谈歌的「城市迁徙」(『当代』, 2004年, 第3期), 何申的「乡长丁满贵」(『清明』, 2004年, 第1期)等。除此之外, 他们的长篇力作, 如何申的「多彩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版), 谈歌的「家园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关仁山的「风暴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天高地厚」(作家出版社, 2009年版)等。

28) 其中的代表作有潘小扬导演的电视剧「人间正道」(1998年出品), 这部作品以周梅森的同名小说为其原作。还有陈国星、朱德承导演的电视剧「抉择」(1999年)。涉及到下岗问题的「月缺月圆」, 由中央电视台播放。关仁山的「唐山眷恋」, 李贯通的「天缺一角」也被拍成电视剧等。

〈参考文献〉

- 邓普,「军队的女儿」,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
- 郭先红,「征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 张长弓,「青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 张抗抗,「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郑建明,「依托与超越—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谈片」,『文艺评论』,1999年,4月。
- 张新颖,「文坛涌动现实主义冲击波」,『文汇报』,1996年,8月,2日。
- 雷达,「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文艺报』,1996年,6月,27日。
- 童庆炳、陶东风,「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 肖复兴、朱向前,「96收获与97展望」,『文艺报』,1997年,3月,4日。
- 陆建华,「关注现实,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钟山』,1997年,5期。
- 徐兆淮,「书写社会与表现自我」,『钟山』,1997年,第1期。
- 郝雨,「在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契合点上——论“三驾马车”与“现实主义冲击波”」,『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7月。
- 杨显硕,「“三驾马车”的创作及其新变」,『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3月。
- 杨立元,「现实主义冲击波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月。
- 萧夏林,「泡沫的现实和文学」,『北京文学』,1997年,6期。
- 王彬彬,「当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文艺争鸣』,1996年,11月,15日。
- 王彬彬,「肤浅的现实主义」,『钟山』,1997年,5期。
- 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 萧夏林,「泡沫的现实和文学」,『北京文学』,1997年,6期。
- 舒也,「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作家的价值观剖析」,『文艺研究』,2003年,3期。
- 姚新勇,「现实主义还是意识形态的弥合剂—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 杨显硕,「“三驾马车”的创作及新变」,『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3月。
- 刘醒龙,「分享艰难」,『上海文学』,1996年,第1期。
- 谈歌,「大厂」,『小说月报』,1996年,第3期。
- 何申,「年前年后」,『人民文学』,1995年,第6期。
- 关仁山,「九月还乡」,『十月』,1996年,第3期。
- 李贯通,「天缺一角」,『大家』,1996年,第1期。
- 何申,「乡镇干部」,『年前年后』,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

〈국문개요〉

90년대 중 후반에 등장한 문학사조 현실주의충격파는 당시의 사회적 문제인 도농의 빈부격차 및 농촌경제의 파탄, 국영기업의 도산 및 인력감축과 조기퇴직 등의 사회문제를 직접 거론함으로써 평론계의 반향을 일으키며 등장하였으나, 해당 사조의 작품이 지니는 제반 문제들로 찬반 양론이 극명하게 갈렸다. 본 논문은 현실주의충격파를 대표하는 일부 작품들을 연구대상으로 하여 우선 인물구성과 인물배치 모식, 줄거리 안배의 이원대립구조, 중심인물 위주의 서사 구조 등에서 문혁시기 작품과 상당한 일치를 이루고 있음을 밝혀 내었다. 또한 이들 작품에는 기층간부 인물이 동일하게 주인공으로 등장하는데 그가 처리해야 할 주요 과제는 모두 재정관련 즉 경제문제이며, 이 해결 과정에서 주요 인물 군으로 경제능력자 인물과 농민/노동자 인물이 등장한다. 주인공 간부 인물은 재원조달을 위해 도덕적 결함을 지닌 경제능력자와 타협을 자행하는 등 현실의 악을 묵인해 버린다. 물론 공산당의 권력이 허가해주는 한에서 일체 경제활동이 가능함에 대한 선포를 잊지 않는다. 둘째, 농민/노동자 인물과의 관계에서 우선 이들에 대한, 심지어 사적인 영역에까지 완벽하게 정보를 수집, 소유함으로써 이들에 대한 유가적 가부장과도 같은 보호 및 통제를 실현한다. 또한 경제문제 해결 과정에서 기층간부 인물은 종종 눈물로 표현되는 진정성으로 노동자/농민의 헌신을 얻어내며 농민/노동자 인물들 역시 기꺼이 자원하여 희생하는데 이 과정에서 이들은 儒家적 가부장제하의 한 가족이 되는 듯 하다. 이런 “관”과 “민”의 관계구조 하에서 “민”이 “주”가 되는 민주주의는 실현 불가능이 일부 작품을 통해 드러나기도 한다. 해당 사조 창작에 몰두했던 일부 작가들의 장편 창작이 금세기 이후 이어지고 있으며, 특히 기층간부 인물의 형상이 텔레비전 연속극이나 주류 영화를 통해 복제되고 있음이 눈에 띈다.

關鍵詞 : 현실주의 충격파, 문혁시기 소설, 인물안배모식, 줄거리구조, 기층간부 인물형상.

이 논문은 2015년 1월 15일에 접수되어 2015년 2월 5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5년 2월 15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